

冷戰結束後波蘭外交政策走向分析*

楊 三 億

(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助理教授)

摘 要

後冷戰時期波蘭外交政策之轉變可謂歐洲政治發展過程中一個相當明顯且重要的變化，本文以外交政策分析架構來檢視波蘭後冷戰時期加入北約、歐盟以及美伊戰爭後的外交政策變化，這些政策變化的主要動力來自對權力追求的強度、對合乎國家利益的理性考量、心理因素如何影響外交政策制定以及探討歷史思維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扮演之角色等。

本文認為波蘭外交政策變化之因在於：第一，加入北約是為了滿足對外部安全環境的需求，以外交政策調整方式獲得安全保證，決策者透過實質理性判斷，滿足加入北約的心理與歷史需求。第二，加入歐盟乃是希望以現代化方向提升國家能力，透過程序理性取得全民共識。第三，美伊戰爭對波蘭而言屬突發性狀況處理，波蘭政府僅能從實質理性角度處理「何種外交政策」才是波蘭國家利益所在，政治菁英以歷史思維的記憶強化決策正當性，並據此調整外交政策。

關鍵詞：波蘭、外交政策分析、北約、歐盟、美伊戰爭

* * *

壹、前 言

本文主要探討冷戰結束後的波蘭外交政策，這個時期的波蘭外交政策不再受蘇聯控制，因而在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享有較高的自主權，但同時又因為國內民主化的變革而使外交政策的制定加入了民意的限制。這些新的變化可以從波蘭加入北約、歐洲聯盟以及 2003 年波蘭參與美伊戰爭等事件來看。加入北約是波蘭重要國家目標，因為成為北約會員國可以讓波蘭獲得外部安全的保證；成為歐盟正式會員國則可以讓波蘭重回歐洲文明發展的主流，而美伊戰爭則為波蘭帶來新一輪的外交政策挑戰，迫使

*感謝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NSC-94-2420-H-160-001。

波蘭須要在美國與歐盟之間選擇立場。這些外交政策的變化有其內外影響因素，透過外交政策分析將可據以了解影響外交決策之諸要素，並預測未來波蘭外交政策之可能走向。

貳、外交政策分析與波蘭外交政策

一、外交政策分析

一般而言，影響一國外交政策變遷的因素不脫離內外部環境的影響，後冷戰時期，波蘭外交政策之變遷足以提供國際關係學界一個檢視新興民主化國家外交政策變化的軌跡。從外部環境來說，柏林圍牆倒塌與蘇聯瓦解等因素相當程度地解放了華沙政府之外在環境限制，日後俄羅斯撤出駐紮在波蘭的部隊，對波蘭重新掌握外交政策之主導權也有正面積極的效果；波蘭內部因素相對應的發展也提供華沙政府外交政策變遷的動力來源，從波蘭內部政治的發展軌跡來看，當波蘭共黨政府與地下團結工聯領袖進行圓桌談判之際（1989年2月）、或是波蘭政府取消禁止團結工聯活動之法令（1989年4月），以及後來團結工聯順利贏得國會大選（1989年6月）、華勒沙當選冷戰後波蘭第一位非共民選總統等（1990年），^①這些因素推動波蘭調整其後冷戰時期外交政策，華沙政府以退出華沙公約，公開表明希望儘速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後同時在極高的全民共識下要求與西歐國家建立更為密切的聯繫、要求加入歐盟。

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 FPA）試圖揉合上述內外因素的詮釋方式，分析國家外交政策取向。傳統上，分析一國外交政策可從「決策過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或「決策層次」（levels of decision-making）兩方面著手，決策過程分析決策體系內的政治制度以釐清決策產出，例如哪些單位或個人擁有決策權力、決策時受到哪些內部因素（domestic constraints）與外部因素（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的影響；^②決策層次則以個人（individuals）、國家（states）與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為主要分析層次，例如決策者的個人特色、國家擁有的權力高低、國際體系呈現兩極對立或多極體系等，都是外交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③請見表一整理。

註① 1990年，波蘭國會修改憲法並通過總統選舉法，將波蘭總統由上議院與下議院組成的國民大會選出改為全民普選，華勒沙（Lech Walesa）並獲選為第一任波蘭民選總統。請見 Witold Mizerski, *Tablice Historyczne* (Warsaw: Wydawnictwo Adamantan, 2002), pp. 295~297.

註② 內部因素如意識形態、國內社會制度、政治制度與民衆偏好，外部因素如地緣因素、國際權力結構等。Richard Snyder, e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註③ Kenneth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1993), pp. 44~79.

表一 外交政策分析（一）

決策過程與決策層次		
	決策過程	決策層次
基本理論架構	釐清決策體系內不同決策方式以明瞭決策產出	區分個人、國家與國際體系決策層次
分析方式	哪些個人或單位擁有最後決定權力、哪些內外部因素影響決策過程。	國際體系為影響決策主要因素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上述外交政策分析之優點在於結構清晰，對決策過程與決策層次有完整的描述方式與分析架構；不過決策過程分析方式著重制度面，重視外交決策體系的制度規範，雖然對影響決策過程的內外因素進行分析，然這些內外因素對外交決策的影響是以因變數而非自變數存在，因此較無法進一步探究決策過程中政策偏好如何改變。決策層次分析方式則重視國際權力結構的分析，從權力分配的角度來檢視外交政策的產出，但較缺乏其他面向的分析方式，因此不容易觀察到外交政策制定的其他變數。因此，本文認為若要能更全面的分析外交政策，我們可從影響決策的諸「要素」著手，這些影響外交政策決策之要素可分為權力追求（power-seeking）、理性考量（rationality）、心理因素（the psychological factor）與歷史思維（the historical thinking），這一種橫向的切入方式可以同時涵蓋決策過程與決策層次分析方式，並同時觀察各種影響外交決策的不同要素。^④

（一）權力追求導向的外交政策分析

現實主義途徑是被廣為熟知的研究途徑，在現實主義框架之下有相當多流派，如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等。這些現實主義的重要論點是國家被假定是追求權力的，^⑤權力追求導向的外交政策著重在國家能力（capability）與其相對權力（power）的展現；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能力通常被視為國際體系下的相對權力大小，國家能力越大則其權力也就相對越大。^⑥

註④ Christopher Hill,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79~81.

註⑤ 請見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1期（民國94年1/2月），頁115~137；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Norton & Company, 2001);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註⑥ 有學者對此說提出質疑，認為一國能力並非就是其國家權力的展現，因此以潛在權力（potential power）來描述國家能力（capability of a state）似較為妥當，請見Mohammed Yunus, *Foreign Policy: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32;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 pp. 106~144.

不過這樣的說法仍須保留，肇因國家能力並不一定總是代表國家在全球政治權力格局下的地位；儘管每個國家能力不同，單一國家卻會盡可能地藉由各種外交手段來提升國家間相對權力比重；除此之外，國家也會以提升國家能力的方式來展現綜合國力的實質成長，所以分析一國外交政策的變化時，也必須同時顧慮到外交政策的實質目標。

此外，對國家能力的認知問題也是另一考慮面向，一國能力的提升（如軍事能力）對不同國家有不同認知，因此能力的展現也就有極大的差異。例如對中共而言，北韓增加數萬武裝部隊之影響層次可能較低；然對南韓或日本而言，北韓增加之數量將可能對南韓或日本等國安全產生重大衝擊。除認知問題外，外交政策分析也須要處理短期外交政策變化的問題，因為國際間相對權力地位的改變與國家能力的提升可能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但單一國家的外交政策卻可能在短時間內出現重大變化。某單一或若干國家在某個時期突然採取躁進或退卻的外交政策，可能以外交政策的調整來改變其在國際權力格局的地位，著眼的是相對權力的變化，而非實質能力的改變。

(二) 理性考量為導向的外交政策分析

除權力考量外，外交政策分析中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素即是理性扮演的角色。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在外交政策分析領域中容易使人混淆，現實主義突出權力與國家安全是國家決策者制定決策時的重要考量，理性主義則強調國家是單一的理性決策者，但對於哪一項標準（國家安全或人道主義等）是國家外交政策考量的重要依據則沒有定論。

決策者根據的理性基礎與追求目標之手段相當程度制約決策過程，並因此影響決策體系與決策者的產出，使其在固定框架內影響最終決策產出。細分理性的內涵，又可區分為「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與「實質理性」（substantial rationality）；從個人與集體的角度來看，則可以區分為「個人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與「集體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而從效率的觀點來看決策模式，則可區分為「效率」（efficiency）與「民主」（democracy）。

程序理性試圖解答如何才能找出最有利、最合理的解決方案，而實質理性則嘗試告訴我們什麼才是正確的決策；前者可能以堅持某種形式（如堅持民主制度或公民投票）的方式進行，在重大爭議的過程中仍不放棄國家基本價值；後者如亞洲金融風暴危機，南韓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指導貨幣政策，儘管此舉對其民族自尊心有害，但仍屬於理性考量後的結果。^⑦

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著重在決策過程參與者的多寡，同時也觸及集體決策過程理性決策的分析，官僚主義、本位主義等不同部門的協商過程都在此等框架底下；集體理性的決策過程顯示，不同個人在決策過程中要整合在單一的施政偏好順序（set of

註⑦ Herbert Simon, "From Substantive to Procedural Rationality," Anthony G. McGrew and M. J. Wilson, eds., *Decision Making: Approaches and Analysi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87~96.

preferences) 是極其困難的。^⑧

效率與程序理性較為相關，民主則提供了不同屬性的個人或群體一個表達意見的管道，在民主國家內部其對外交決策影響尤為巨大。公民投票的決策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協助政府推動政策最有效的背書工具，但並非所有公民投票的結果都會讓政府滿意，公民投票的結果偶爾也會成為政府施政的絆腳石。^⑨

(三) 心理因素為導向的外交政策分析

決策者的心理狀態也可能影響外交政策的產出，毛澤東與史達林的威權性格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影響冷戰期間中國與俄國外交關係甚鉅。^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學者性格與堅持理想主義的特色，為當時的國際局勢劃下重要標記。集體的決策行為通常被描述成較負面的形象，社會學眼中的群眾行為通常被認為不易控制，群眾運動也相對容易遭控制與引導，並因為資訊傳播的方式致使群眾運動以悲劇收場。無論是威權性格或是學者性格，領袖的個人魅力 (charisma) 是發揮這些性格之主要動力所在。

與心理因素息息相關的則是認知問題，決策者的「心理環境」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和其實際所處的「操作環境」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未必相符，決策者所認知到的心理環境，並不一定真實反應現實的操作環境，尤其當外部事件出現斷續現象時更不容易解釋。^⑪進一步聯繫到外交政策的分析過程，即是國際關係學界較常提及之「社群」 (community) 概念，決策者面對國際關係各項議題的回應，如對中介組織 (如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 的看法、對各項議題領域的探討 (如信心建立措施、軍備控制等) 以及決策者的認知過程和意向 (cognition process and disposition, 指社群成員的知覺與學習等心智過程，包括目標評價、他我關係以及訊息處理等)、對決策者的知覺錯誤 (perceptual illusions, 可分為認知型誤判與動機型誤判

註⑧ Richard Little, "Belief Systems in Social Sciences," Richard Little and Steve Smith, eds., *Belief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1988), pp. 37~56.

註⑨ Kenneth Waltz,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Mass.: Little Brown, 1967).

註⑩ T.W. Adorno, E. Frenkel-Brunswick, D. N. Levinson and R. N.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1950).

註⑪ 例如就兒童性別認同的起源論，社會學習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 認為性別認同的刻板印象可以透過兩種方式學得：透過獎賞懲罰 (父母施加) 或者是藉由觀察外界 (孩子觀察) 行為獲得，而心理分析論則認為由兒童認同性父母並進而想要看齊的心態造成；性別發展認知理論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認為兒童是因為先發展出了性別認同的概念之後，才會選擇性的去模仿所認同的性別相同典範。而什麼時候兒童才會發展出性別認同呢？這就與認知發展能力相關，兒童必須知道性別屬性不會改變，才會產生學習模仿的行為；認知建構論 (cognitive constructivism) 認為人生下來並不具備任何先天的認知結構，人的知識是個體與外界互動過程中，藉由同化 (assimilation)、調適 (accommodation)、平衡 (equilibration) 逐步建構的。請見 Harold H. Sprout,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Co., 1962), pp. 122~135; or Christopher Hill,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pp. 108~116.

等)、對學習的心智過程等。^⑫這一些潛存的、無法以直接、客觀方式觀察到的影響決策因素，實際上可能極大地影響外交政策的產出。

(四) 歷史思維為導向的外交政策分析

近來興起的後實證主義強調從認同 (identity)、語言 (languages)、觀念 (ideas)、價值 (values) 等途徑進行研究，^⑬這些研究途徑對傳統外交政策分析提供一個新的研究面向。例如，從語言面向來說，其所承載的特殊民族文化因素顯示的是民族認同面向的展現，而外交政策所凸顯的正是展現這一國家 (或民族) 的文化內涵；同時，透過對語言和認同的分析，外交政策決策人士也可以自我省察行動背後的基本依據。^⑭

表二 外交政策分析(二)

橫切面 (影響決策諸要素)				
	權力追求	理性考量	心理因素	歷史思維
基本理論架構	重視國家能力與其相對權力的展現	決策者根據的理性基礎與追求目標之手段	影響決策者的心理因素，包含決策者所處的心理環境與操作環境	認同、語言、觀念、價值等將對外交決策產生重大影響
理論分析要點	波蘭外交決策是否滿足提升國家相對權力展現？有沒有其他目的是該行動的更高目標？	該決策根據的理性基礎是程序的還是實質的？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還是堅持某種基本原則？	決策者如何認知其所處的外部環境？外部環境又是透過何種方式影響決策者？	決策者如何面對歷史思維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全盤接收或進行部分修正？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各家理論綜合整理。

對外交政策分析理論來說，歷史記憶可能影響一國外交決策過程，記憶的一個關鍵作用在於記憶如何被政治精英做工具性的理解、使用與誤用。^⑮通常，分析者會問

註⑫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

註⑬ Keith Krause, *Culture and Security---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Morton Keltrup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註⑭ Christopher Hill,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pp. 9~11.

註⑮ 記憶可以分為四種不同的形式：1. 作為中立的認知/描述工具；2. 作為對歷史事件的深層的認知/反射工具；3. 對過去與現在事件情感的評估；4. 作為合法性的工具使用。Marek Ziolkowski, "Three Levels of Social Chang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wentieth Century and Four Functions of Memory Thereof," Radoslaw Markowski and Edmund Wnuk-Lipinski, eds., *Transformative Path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arsaw: Instytut Studiow Politycznych Polskiej Akademii Nauk, 2001), pp. 119~131.

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根據歷史記憶的判斷，現行外交政策的改變和過去外交政策有何關聯？這些關聯會對國家產生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影響；第二，對個人或群體來說這些改變是正面或負面的；第三，誰應該對此負面的變化負責？對波蘭而言，影響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即是過去歷史經驗，政治菁英與大眾常會將現行政策與過去經驗類比，並試圖找出類似或相異之處。

二、冷戰結束後初期波蘭內部環境： 為「回歸歐洲」而向綜合性安全過渡

本文所稱後冷戰時期乃是指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波蘭民主化過程中的分期，外界或以柏林圍牆倒塌（1989 年 11 月 8-9 日）、或以羅馬尼亞西奧塞古政權垮台（1989 年 12 月 22 日）、或以歐安會議宣告冷戰結束（1990 年 11 月 19-21 日）、^⑥或以華沙公約解體（1991 年 7 月 1 日）、或以蘇聯瓦解（1991 年 12 月 20 日）來作為冷戰結束的分期。^⑦這個時期的特色是歐洲地區兩極體系對立的瓦解，同時中東歐國家延續先前內部對民主之訴求，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政治與經濟改革。從上述的理論分析架構回到波蘭於後冷戰時期所處的國內與國際環境，對理解波蘭政府外交政策制定過程更有幫助。影響後冷戰時期波蘭外交政策的一個非常重要因素，就是如何在「不確定的環境當中」（冷戰結束初期，中東歐國家對俄國是否願意給予真正的獨立感到不確定）增加對「安全」的追求，在此種環境因素的限制下，波蘭外交政策的特色就是為因應環境改變而產生決策上的轉變。

伴隨著 1989 年 4 月舉行前所未有的圓桌會議（Roundtables Talks），波蘭開始推動民主化過程，在一連串的民主過程中，推動了憲法修正案、工會法修正案、議會選舉法、集會結社法等各項政治自由法案，並重新設立參議院、總統職位以及實行多黨的政治制度等。^⑧在整個協商過程中，當時的執政黨統一工人黨被迫與反對派團結工聯（Solidarity）就當時重要之政、經問題展開談判。團結工聯利用形塑社會輿論的方式主導輿論走向，就當時的媒體自由、司法獨立、政黨開放、工會組織等問題展開辯論；在 1989 年 6 月 4 日舉行首次自由選舉之前，團結工聯將這些議題當作衝擊波蘭政府的有效利器。

波蘭的民主派人士在國內要求實行政治改革，在對外關係上則強調「回歸歐洲」（return to Europe）的必要性，民主化後首任非共黨總理馬佐夫斯基（Tadeusz

註⑥ 在巴黎召開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第二次元首高峰會上，當時的美國總統老布希與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和其餘 32 國歐洲元首共同宣佈冷戰結束，並開始著手 CSCE 的制度化過程，也就是轉型成為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請見 <http://www.osce.org/item/15831.html>。

註⑦ Todd Sandler and Keith Hartl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O---Past, Present, and into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0.

註⑧ Roger East and Jolyon Pontin, *Revolution and Chang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Wellington House, 1997).

Mazowiecki) 強調為回歸歐洲，波蘭必須重新建構對國家發展的認知，才能使波蘭順利調整該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目標，其實質表現就是將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列為首要施政目標，內政議題成為達成外交政策目標的重要手段。^⑩

和過去思維不同之處在於，波蘭外交思維由過去「兩極體系對抗」轉變為回歸歐洲。在兩極體系的國際格局下，東西陣營相互隔離，波蘭政府僅須固守國防與領土安全，即可保衛國家安全；然而後冷戰時期，華沙政府以回歸歐洲作為外交政策主要目標，在此目標下，波蘭重新建構其與西方各國包含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交流在內的關係，波蘭與西方各國之交往關係頓時出現前所未有之密切互動，連帶對波蘭國家安全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華沙政府調整安全認同，由軍事安全向綜合安全過渡，其主要內涵展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國家領土與主權之維護

在兩極體系對抗時代，國家對權力之追求是不同國家間互動最主要的表現方式，這些對權力的追求包含了強調軍事武力的擴充、戰略位置的爭奪以及鞏固重要能源運輸管道等。冷戰結束後，東西歐國家對立的緊繃情勢大幅降低，歐洲再度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也相當微小，因此國家雖不可能放棄對權力的追求，然其爭奪重要資源之強度與方式已見緩和。對波蘭而言，波蘭獲得完全獨立之主權地位始自後冷戰時期，冷戰期間波蘭受蘇聯統治的記憶猶新，鞏固國家領土與主權仍是國家重要之外交目標，然其方式或和冷戰時期有所不同，波蘭須在符合西方規範的前提下，滿足其對領土與主權維護的目標，這些具體目標的達成包括確立文人領軍、國防體制改造、國家軍事戰略調整、人事精簡等。^⑪

(二) 經濟安全之維護

當波蘭努力爭取西方各國的援助與投資時，波蘭也將無可避免的受到西方各國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在經濟面向上，經濟體制需要進一步的自由化、放鬆外匯管制、市場價格與土地的交易管制、國有企業重組、國家對國有企業的財政補助等；^⑫鞏固與強化波蘭國家內部競爭動力成為外交政策中的根本環節，華沙政府意識到唯有健全國家體制發展，其外交政策才能具有相對競爭優勢。在以往國家經濟相對封閉的情況下，國家只要守住大門，經濟就可以比較不受干擾的運行，今天幾乎所有國家的經濟都與世界市場有密切關係，特別會受到國際組織、跨國公司以及國際金融力量的影響，同時也可能會受到各種國際危機的打擊，如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等；解決危機也需要各

註^⑩ Jon Elster,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21 ~ 68.

註^⑪ Stanislaw Koziej, "Polish Defense Policy's Evolution," Roman Kuzniar, ed.,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1989-2000* (Warsaw: Scholar Publishing House, 2001), p. 405.

註^⑫ 波蘭未加入歐盟之前，政府對大多數關係重要民生物資採行補貼政策，造成國有企業效率不彰、冗員充斥的現象。中長期來看，如果政府解除對公有企業的補貼，對其競爭地位將有極大衝擊。

國以協商談判的方式達成，這些因素對波蘭外交政策之調整產生重大影響。

(三) 能源安全之維護

波蘭能源大抵上以進口為主，其主要來源為俄國，因此分散石油來源是鞏固安全之重要目標。波蘭國營的石油公司（Polish Gas and Petroleum Mining Company, PGNiG）向外採購的石油主要依賴俄國，俄國的石油天然氣工業公司（Gasprom）掌控波蘭 50-60 % 的石油供應。^②雖然波蘭嘗試向外分散油源進口（如丹麥），不過因成本與國際市場考量，波蘭分散能源進口的目標目前仍不易達成。^③

(四) 社會文化安全的維護

冷戰結束後，波蘭甫自前蘇聯集團陣營脫離而享有完整的獨立狀態，然其鞏固民族認同與重拾對文化的信心卻可能面臨加入歐盟的挑戰，華沙政府須謹慎面對在加入歐盟之過程中，民族認同是否可能被歐洲認同所取代。

叁、到北約之路：俄國撤軍與加入北約

勾勒波蘭後冷戰時期外交政策藍圖的前外交部長史庫比雪夫斯基（Krzysztof Skubiszewski）在波蘭重獲實質獨立後擬定外交政策基本方針，^④其所籌劃的外交政策三大主軸，分別是「重獲波蘭國家主權獨立」、「回歸歐洲」、「平衡的東西雙軌政策」。^⑤第一項「重獲波蘭國家主權獨立」目標即是擺脫俄國駐軍問題，再以加入北約的方式重獲主權獨立的地位。^⑥

一、俄國撤軍與波蘭重獲國家主權獨立

前文所述，影響後冷戰時期波蘭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如何在「不確定的環境當中」增加對「安全」的追求。冷戰結束初期，包含波蘭在內的中東歐國家無

註② *Wprost*, November 9, 2003, p. 38.

註③ Edward Halizak, "Economic Aspects of Polish Security Policy," Roman Kuzniar, ed.,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1989-2000* (Warsaw: Scholar Publishing House, 2001), pp. 466~489.

註④ 其就任期間為 1991 年 1 月至 1991 年 12 月，當時總理為 Jan Krzysztof Bielecki。

註⑤ 這三大目標分別是：“to regain and re-establish Polish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on a secure basis,” “to ‘return to Europe’ through achieving membership of all pan-European bodies, associating with the EU as rapidly as possible and becoming part of the continent's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through developing close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with all its major states, notably Germany, France and Britain,” and “a ‘dual track’ policy until the USSR broke up.” See George Stanford, “Overcoming the Burden of History in Polish Foreign Policy,”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 19, No. 2 (June 2003), pp. 178~203.

註⑥ Marek Menkiszak, “Difficult Neighborhood: The Security Question in Polish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Roman Kuzniar, ed.,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1989-2000* (Warsaw: Scholar Publishing House, 2001), pp. 148~150.

法確定俄國是否願意給予這些國家真正的獨立地位，這些國家擔憂俄國仍將透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宰制中東歐國家，這些問題又以俄國駐軍為最。蘇聯雖然於1991年12月瓦解，但其國家繼承者俄國仍然在波蘭境內留有駐軍，俄軍更在波海三國駐有大約7萬多名的部隊，這些部隊對當時各國真正能否獨立產生極大威脅。當時波蘭的決策環境考量是，如果俄國藉由訴諸保護俄裔軍民的方式要求延遲撤離軍隊，則波蘭企圖享有完全獨立自主之期望將再度落空。²⁷

波蘭希望儘速撤離俄國駐軍的過程初期不甚順利，俄國原先企圖以包裹的方式統一規範未來俄國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國的互動架構，要求這三國不准與其他國家簽訂有害俄國的協議，也不允許外國軍隊駐紮在這些國家境內。²⁸在經濟安全方面，俄國也嘗試透過與這些國家締結更緊密的經濟合作模式來鞏固俄國的勢力範圍，這些戰略上的考量使雙方對於確定俄國撤軍日期顯得步伐緩慢。波蘭採取的策略是在1992年一方面先與俄國簽訂友好條約（The Treaty on Friendly and Good-Neighborly Relations between Poland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來緩和雙方猜忌心態，強調雙方互信基礎；另一方面則是加強波蘭與其他中東歐國家的合作，如維斯格拉瓦集團（Visegrad Group）與波羅的海國家委員會（The Council of the Baltic Sea States），以凸顯這些國家立場一致，不願個別受到分化。最終隨著波俄雙方談判的結果，俄國終於在1992年10月28日撤出駐在波蘭的軍隊。²⁹

二、加入北約

俄國撤軍後的波蘭外交政策依然受到外部環境相當大的制約，外部依然存在一個有潛在敵意的俄國及其東鄰國家；內部民選政府雖有民意基礎，但仍處於一個相對不穩的階段，轉型後的共黨依然在國會扮演重要力量，經濟改革的陣痛也帶來大量失業勞工與社會問題。因此，穩固國家外部安全以提供國內健全的發展環境是當時最主要的思考方向，在波蘭尚未正式成為北約會員國之前，波蘭政治菁英曾思考過幾項可能的外交政策選項：

（一）繼續與蘇聯/俄國保持同盟關係。該選項曾經在波蘭內部引起討論，剛開始波蘭內部有一種聲音，認為應該和蘇聯/俄國繼續保持軍事聯盟關係，支持這種說法的觀

註²⁷ 國內有俄國駐軍，加上還有許多的俄國裔居民住在這塊土地，構成了波蘭最擔心的一件事：軍事武力的威脅，俄國總統葉爾欽就明白表示，如果俄裔居民在這些國家得不到應有待遇，俄國將推遲駐軍的遷移。請見波蘭國會出版品 Interparliamentary Relations Bureau of the Chancellory of the Sejm, ed., *The New Baltic Security Environment: Trends and Challenges* (Warsaw: Sejm Publishing Office, 1998), p. 74.

註²⁸ J. M. Nowakowski, "Polska Polityka Wschodnia w 1991 roku," *Rocznik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1991* (Warszawa), p. 82.

註²⁹ 在俄國撤出最後一支部隊之前，與波蘭簽署了「俄波友好睦鄰條約」（The Treaty on Friendly and Good-Neighborly Relations between Poland and Russian Federation, May 22, 1992）來作為理順雙方關係之基礎，不過俄國終究不願意過早承認撤軍時間，僅願模糊的承認將於1992年底撤出部隊。請見 Roman Kuzniar, "Security Policy in Polish Foreign Policy," Roman Kuzniar, ed.,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1989-2000* (Warsaw: Scholar Publishing House, 2001), pp. 19~91.

點主要在於蘇聯在當時仍是一個大國，而從過去經驗來看，統一後的德國將會是潛在威脅，未來可能會對波蘭造成威脅。雖然該選項獲得波蘭內部少數左派力量支持，但該選項始終沒有受到當時政府決策圈的重視。^⑩

(二) 中立選項。波蘭政府曾經考慮過仿效芬蘭中立化的外交政策，藉以避免未來涉入德俄兩國紛爭，不過中立的外交政策被當時大多數的波蘭政治菁英認為是等同「孤立」的選項，中立選項將會造成拒絕西方援助而使波蘭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日後並將再度淪落至俄國的勢力範圍；此外，當時波蘭的軍事能力也不足以支撐中立的外交政策，地緣政治的因素將無可避免把波蘭拉進西方與俄國的地緣爭奪戰略之中。^⑪

(三) 次區域合作。當時西歐國家普遍希望在不激怒俄國的前提下讓中東歐國家自行堅強起來，以中東歐區域合作的方式暫時解決權力真空的問題，這一想法被波蘭相當程度接受，並在日後組成各種次區域組織，不過這些行動都不是當時外交政策的主軸。^⑫

(四) 聯合國和歐安組織。重視國際組織途徑解決外交紛爭的若干外交菁英認為，聯合國以及歐安組織（CSCE/OSCE）可以做為未來處理歐陸甚至全球爭端的主要機制，然而缺乏強制力的軍事實力以及擔憂俄國未來掌控歐安組織運作的可能，排除了以聯合國和歐安組織作為波蘭外交政策主要選項。^⑬

(五) 北約選項。加入北約的外交政策選項並非從一開始就沒有爭議，波蘭左翼和軍方起初並不熱衷此一選項，基於保守心態影響所致，軍方初期抗拒與西方進行軍事交流，傳統上與俄國建構起的軍事合作機制更加大了波蘭與西方國家合作的困難，所以新上台的執政黨雖然將加入北約視為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標，最終則以改編軍事指揮體系與人事重組的方式化解內部反對聲浪。^⑭

從上述分析來看，到北約之路是當時波蘭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標，但外部因素卻對波蘭的北約之路形成極大挑戰；^⑮實際上，制約當時波蘭外交政策的內外部因素相互關連，因為加入北約組織需要相關因素的配合，除北約提出的「民主」、「文人領

註⑩ *Ibid.*, pp. 37~39.

註⑪ *Ibid.*, p. 40.

註⑫ 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於1992年12月成立中歐自由貿易區（Central European Free Trade Area, CEFTA）來作為主導中歐地區發展的主要國際組織。請見楊三億，「後冷戰時期中、東歐地區權力結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2期（民國91年3/4月），頁97~99。

註⑬ 歐安組織缺乏真正武力仲裁的實力導致波蘭對該組織之功能持保留態度，不過也有相對意見認為歐安組織在爭端解決的機制上扮演超乎想像的角色，請見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註⑭ 軍方當時持保留意見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其保守心態與語言障礙，軍方不擅長以英語和北約國家溝通，同時擔憂後繼者將會趁機取代既有位置；軍方也擔憂其必須學習新的軍事交流經驗，增加軍事訓練的困難度，因此當時波蘭總統華勒沙以大力拔擢親信的方式將軍中人事重新整頓，不過此舉也招來眾多批評。Roman Kuzniar, "Security Policy in Polish Foreign Policy," pp. 19~91.

註⑮ George Grayson, *Strange Bedfellows: NATO Marches East*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9).

軍」、「專業組織」、「與其他北約國家相應的軍事訓練能力」等實質標準外，^③美國對北約東擴的態度是主要關鍵。美國對北約何時東擴，應該納入哪些國家的態度動見觀瞻，原先美國擔憂北約東擴可能會激怒當時的俄國，此種謹慎心態對其他西歐國家而言更為重要，因為西歐剛脫離冷戰時期的對抗狀態，絕大多數國家並不樂見歐洲大陸再度擺盪回兩極對抗的國際體系。^④

美國對北約東擴表現積極的態度始於1994年底，內政與外交因素顯示美國對北約東擴態度轉變其來有自。199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促使柯林頓希望能盡早爭取中東歐裔美國人選票的支持，因此對北約東擴探正面態度，波裔團體「波裔美國議會」(Polish American Congress)也趁機整合其他團體在美國國會大力進行遊說。^⑤除內政因素外，日益升高的巴爾幹半島危機使美國重新考量北約東擴問題。南斯拉夫前總統米洛塞維奇雖期盼以鐵腕方式繼續維繫南斯拉夫領土完整，然南國境內各民族獨立情緒的高漲使米洛塞維奇的期盼遭受極大挑戰：1991年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與馬其頓相繼宣佈脫離南斯拉夫、^⑥1992年波士尼亞亦舉辦公民投票宣布獨立，頓時南斯拉夫地區陷入四分五裂、戰火頻仍的狀態。北約正式介入巴爾幹半島的內戰始於1993年4月2日，當時北大西洋理事會(North Atlantic Council, NAC)一致決議，敦請北約秘書長沃納(NATO Secretary General Manfred Wörner)盡速向當時聯合國秘書長蓋里(UN Secretary General Boutros Ghali)表明北約將支援實行聯合國816號決議，也就是配合實施波士尼亞上空禁航區(non-fly zone)的規定，北約將部署空中預警系統監視波士尼亞禁航區，因此當1994年北約擊落南斯拉夫部隊四架戰機時，巴爾幹半島緊張局勢再度升高，並促使北約認真思考如何穩定巴爾幹半島局勢與北約如何東擴之問題。^⑦

巴爾幹危機促使美國認真思考後冷戰時期北約應如何維持歐洲安全的問題，其中一項解決方案即是擴大北約成員國，以逐步東擴的方式將前東歐國家納入北約組織，藉以穩固巴爾幹半島局勢。^⑧北約東擴的另一項好處是減輕美國駐軍海外之壓力，希

註③ Those criteria ar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civilian control over the army," "technical-organizational efficacy," and "the level of training they are comparable with those countries that had joined NATO in the past," see Roman Kuzniar, "Security Policy in Polish Foreign Policy," *op. cit.*, p.68.

註④ Boguslaw Winid, *Rozszerzenie NATO w Kongresis Stanow Zjednoczonych 1993-1998* (Uniwersytetu Warszawskiego: Rozprawy I materialy Osrodka Studiow Amerykanskich, 1999).

註⑤ Les Kuczynski, *Expansion of NATO: Role of the Polish American Congress* (Chicago: Alliance Printers and Publishers, 1999).

註⑥ 斯洛維尼亞的獨立運動較為平和，與南斯拉夫軍隊鏖戰10日後局勢大致穩定，但克羅埃西亞則耗時近四年的時間才完全將駐紮在克國境內的塞爾維亞軍隊移出。

註⑦ John Kriendler, "NATO's Changing Role: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or Peacekeeping," *NATO Review*, Vol. 41, No. 3 (June 1993), pp. 16~21; or see <http://www.nato.int/docu/review/1993/9303-4.htm>.

註⑧ Charles-Philippe David, "Alice in Wonderland Meets Frankenstein: Constructivism, Realism and Peacebuilding in Bosnia,"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London), Vol. 22, No. 1 (April 2001), pp. 1~30.

望未來能逐步將歐洲防務移交給波蘭與其他中東歐國家。^②前南斯拉夫分裂與波士尼亞戰爭爆發讓美國重新思考北約東擴的可能性。

因此，當時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北大西洋理事會布魯塞爾會議上公開發言支持北約東擴，同時美國 1994 年通過「北約參與法案」(NATO Participation Act)，與 1996 年的「北約擴大實現法案」(NATO Enlargement Facilitation Act) 為北約東擴奠定基礎。^③美國通過法案的決心同時展現 1995-1997 年之間，撥款近 3 億美元協助 23 個「北約和平夥伴」(NATO's Partnership for Peace, PFP) 會員國，^④其中將近一半的資金流入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六國。^⑤

其次，關於俄國如何回應北約東擴的問題，西方國家的關注點在於如何使北約向東擴大，同時還能減低俄國反對聲浪。西方國家要讓俄國明白，北約東擴並沒有傷害俄國的意圖，其具體展現的行動方式即是促成「北約俄羅斯合作與安全雙邊關係基礎法案」(Founding Act on Mutu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NATO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ay 27, 1997) 的出台，^⑥這項法案主要目的在於「基於雙方的誠信，讓北約與俄國之間建造一個穩固、和平與團結的歐洲」。實際上，「北約俄羅斯合作與安全雙邊關係基礎法案」是延續了 1991 年設立的「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 NACC) 的精神而來，^⑦其目的在於透過制度性的設計，讓北約與俄國進一步促成軍事合作。2002 年 5 月 28 日，北約與俄國在基礎上共同設立「北約俄國理事會」(NATO-Russia Council)，此舉的意義在於結合當時北約 19 個成員國與俄國，提供一個相互諮商平台，透過定期化的溝通方式，逐步了解彼此利益差異所在，並逐漸形成共識。^⑧

註② *Polish News Bulletin* (Warsaw), February 13, 2003, p.1.

註③ 實際上在更早之前，北約在 1989-1991 年間，連續三年在布魯塞爾 (1989 年)、倫敦 (1990 年)、羅馬 (1991 年) 召集會議，會中已逐步視中東歐為西方國家的潛在合作對象，並且願意和這些國家舉行對話，但是波、匈、捷等國野心更大，聯合拜訪北約總部，提出加入北約的要求。Roman Kuzniar, "Security Policy in Polish Foreign Policy," p. 30.

註④ 北約和平夥伴 (PFP) 是在美國建議下於 1994 年 1 月在北約布魯塞爾高峰會議上通過。和平夥伴計劃的主要內容包括：1. 北約正式邀請前華沙條約組織國家和歐洲中立國參加和平夥伴計畫，在軍事演習、維和、危機管理等方面進行合作；2. 夥伴國可向北約總部派出聯絡員；3. 夥伴國必須承認西方的民主、人權標準，並尊重現有邊界。<http://www.nato.int/issues/pfp/>.

註⑤ See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NATO Enlargement: US and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Assist Potential New Member*, Report to the Chairman,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GAO/NSIAD-97-164, US GAO, Washington, D.C., June 1997.

註⑥ See NATO On-line Library, <http://www.Nato.int/docu/basicxt/fndact-a.htm>.

註⑦ 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 (NACC) 是北大西洋理事會 (North Atlantic Council, NAC) 高峰會於羅馬 (1991/11/07-08) 舉行時，以維持和平行動與危機管理為目標而成立的組織，該組織成員包含北約組織與非北約組織成員國，可以說 NACC 的設置使中東歐國家與北約之間構起第一道正式溝通管道，日後該法案並促成「北約俄羅斯常設委員會」(NATO-Russia Permanent Joint Council, May 27, 1997) 的設置，成為協調北約與俄國主要的溝通機制。Margarita Assenova, "The Debate on NATO's Evolution,"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003, pp. 49~50.

註⑧ *Ibid.*, p. 51.

再其次，對其他西歐國家來說，既然美國願意承擔大部分北約東擴費用，如果又能透過若干制度上的安排消除俄國對北約東擴的疑慮，則北約東擴可能帶來之正向利益（促進歐洲穩定、協助穩定可能到來的歐盟東擴、促進歐洲東西間的交流等），皆是西歐國家政治菁英所樂見的發展。

波蘭加入北約的心願終於1999年達成。1999年2月17日，波蘭國會（Sejm and Senat）批准波蘭加入北約的條約，經總統簽署後正式生效，同年3月，波蘭和捷克、匈牙利同時正式受邀加入北約。從歷史眼光來看，波蘭幾乎是獲得了歷史上最具有效力的外部安全保證，成為北約會員國後的波蘭不僅可以更有自信地面對德國統一，同時也有助於波蘭抵消來自東方的潛在威脅，積極管理與因應可能爆發的如區域性的種族衝突問題，對波蘭在中東歐地區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亦有助益。^④波蘭加入北約後仍扮演積極的角色，並不因為獲得一紙保證而忽略應盡義務。波蘭著手國防現代化的改革有兩大目標，一方面朝機動化與專業化部隊轉型，^⑤另一方面則縮減常態性徵兵部隊，減低軍事支出，這些重整目標是希望使波蘭軍隊能應付後冷戰時期新的國防任務。^⑥

目前波蘭軍事改革初見成效，武裝人員已從1989年的40萬裁減至2003年的16萬5000人，預計到2006年底將裁減至15萬人；軍隊部署主力則由西邊防務轉向東邊防務，重視波蘭邊境東邊可能發生的小規模區域性衝突；國內軍事指揮體系則採人文領軍的模式，將軍事幕僚併歸國防部指揮；在軍事人員訓練方面，則期盼有三分之一的武裝人員可與北約部隊相互協調進行軍事任務。^⑦

波蘭加入北約後立即面臨巴爾幹半島危機的處理，亦即1999年3月的科索沃危機。美國對此事件除給予波蘭安全保證外，也要求波蘭日後更積極參與北約的各項行動。^⑧因此，2003年波蘭除直接參與美國對伊戰爭（本文第四部份將繼續討論）外，也參與了北約在伊拉克之軍事人員訓練，以一個積極的新進會員國之姿參與北約各項任務。^⑨

從外交政策分析的角度來看，波蘭加入北約的最大滿足是對權力的追求，這是一種國家重新獲得獨立後為提升國家安全係數的外交政策展現，從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

註④ Juraj Marusiak, "Poland as a Regional Power and Polish-Slovak Relation," *Slovak Foreign Policy Affairs*, Vol. 2, No. 1 (Spring 2001), pp. 36~55.

註⑤ 這當中還包含了波蘭近年來最大的軍事採購案，向外採購戰機以提升空防現代化，原先屬意的是法國幻影戰機或美國F-16，最終則是決定向美國購買。請見 *The Warsaw Voice*, February 8, 2004, p. 7.

註⑥ *Rzeczpospolita*, January 30, 2004, p. A8.

註⑦ Marcin Zaborowski and Kerry Longhurst, "America's Protégé in the East? The Emergence of Poland as a Regional Lea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9, No. 5 (October 2003), pp. 1009~1028.

註⑧ 如科索沃維和行動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Mission to Kosovo, or Kosovo Force, KFOR)，請見 Czeslaw Piatas, "Polish Armed Forces and NATO Membership," *Military Technology*, Vol. 28, Iss. 8 (Aug. 2004), p. 35.

註⑨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0, 2004.

來說，即是一種天生尋找安全保障的生物趨力，^⑤這一種觀念的投射也同時影響決策者對外部環境的決策認知。西方國家多數精英認為，歐洲大陸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極低，但雖然冷戰結束，他們卻思考小型戰爭與區域衝突存在的可能性，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延續國家間的衝突，因此國家仍須要鞏固得來不易的主權，北約的存在極其重要。故當歐洲國家談及北約是否已無存在必要時，前波蘭外交部長 Bronislaw Geremek ^⑥即以戲謔的口吻表示：「當東西陣營對峙之時，西歐國家有美國北約的保護傘，而波蘭僅能偷偷夢想著馬歇爾計畫與北約會員身份，因此，波蘭目前思考的不是如何讓美國退出歐洲，而是如何強化北約在歐洲的功能。」^⑦

其次，影響波蘭外交政策的另一因素是波蘭民衆對加入北約的共識。波蘭民衆對波蘭應該成為北約會員國有極高共識，早在 1999 年之前，波蘭民意調查顯示，支持加入北約的比例約在八成左右，並曾有高達近九成的支持率，顯示此項政策獲得政治精英與一般民衆的高度認可。^⑧

再其次，波蘭 1999 年加入北約後立即面臨科索沃危機，2001 年又適逢九一一事件，對波蘭參與歐洲乃至全球安全問題有重大影響，在強化北約作用的思維邏輯下，波蘭政府積極參與各項任務，並從中思考波蘭未來在北約的地位。

表三 波蘭外交政策分析：以加入北約為例

	權力追求	理性考量	心理因素	歷史思維
理論探討	重視國家能力與其相對權力的展現	決策者根據的理性基礎與追求目標之手段	影響決策者的心理因素，包含決策者所處的心理環境與操作環境	認同、語言、觀念、價值等將對外交決策產生重大影響
加入北約	直接獲得外部安全保證，對國家權力展現有直接助益	決策者根據實質理性判斷加入北約最爲合乎國家利益	對外部環境的恐懼因素與主權獨立未久積極向外尋求保障的心理狀態	決策者慣於引用過去歷史經驗提醒民衆不作爲的可能後果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架構分析而得。

註⑤ 古典現實主義也有人稱之爲「人性的現實主義」(human nature realism)，該說主要認爲人性中潛存的意志是驅動國家爭奪權力的深層結構因素，請見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19.

註⑥ 其就任期間爲 1997 年至 2000 年，當時總理爲 Jerzy Buzek.

註⑦ 原文爲“ While you, Western Europeans, were together with the Americans, we, residents of Eastern Europe, could only dream of the Marshall plan or NATO membership. No wonder then today, mindful of times of captivity and totalitarianism, that we desire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bonds between Europe and USA, not their weakening.” 請見 *Polish News Bulletin* (Warsaw), April 7, 2003, p. 1.

註⑧ Presentation by Jerzy Kozminski (Ambassador of Poland), “NATO Enlargement: Political Issues and Public Perceptions in Pol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7, 1997), <http://www.polishworld.com/polemb/nato/speech/address3.html>.

肆、到歐盟之路： 波蘭外交政策中的「現代化之錨」

波蘭加入歐盟是「回歸歐洲」另一個重要核心觀念，因為除了外部環境安全的鞏固外，加入歐盟並展開與歐盟會員國全面性交往有助於經濟、能源、社會文化等安全穩固，更重要的是，此舉符合現代國家對綜合性安全的要求。過去共產主義制度實行的結果，造成了政府僅重視國防軍事工業的發展，而忽略了民生工業的配合；重視國家機器的統治地位，而忽略了民間組織的中介力量；重視媒體做為政府宣傳工具，而忽略媒體監督政府之功能等。這些因制度選擇的差異造成東西歐國家在發展上割裂，是包含波蘭在內的中東歐國家亟欲彌合的障礙，而他們堅信加入歐盟將有助於達到這個目標，也就是希望藉助歐盟來完成波蘭現代化，故歐盟扮演「現代化之錨」的角色。④這也可以從波蘭2003年公民投票加入歐盟的結果來看，當時公民投票的支持率高達77.5%，顯示全民對加入歐盟有極高共識。⑤

波蘭希望加入歐盟的實質目標，除了能夠達到「回歸歐洲」的基本目標外，加入歐盟還可以加強政府職能運作。加入歐盟之前，波蘭就已經陸續調整國內法律以符合歐盟標準一部分特定市場的獨立運作、更為保護消費者與反對獨占的法律，而Know-How的轉移更是波蘭社會不可或缺的。因此，加入歐盟反倒加強波蘭政府施政能力，利用外部因素使波蘭政府更能順利推動改革政策。⑥除此之外，從經濟角度來看，如果波蘭拒絕加入歐盟，雖不至於立即出現與西方的發展斷裂（development gap），不過一般預期，這個斷裂會越來越寬，波蘭每年的經濟成長率將不會超過4%，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計算，2014年波蘭的國民生產毛額僅約為歐盟水準的49%。根據經濟學家的預測，如果波蘭繼續被排除在歐洲的大經濟圈之外，波蘭貨幣茲羅堤（Zloty）與歐元的幣值比將可能大貶，弱勢的茲羅堤還可能加重國內的通貨膨脹。⑦同時，如果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順利加入歐盟，則最早可能於2030年保、羅兩國的國民生產毛額即超越波蘭，對波蘭在歐洲的競爭地位將有極大影響。⑧此外，波蘭加入歐盟前的外部基金即將使用完畢，波蘭將無法繼續得到補助，並將連帶促使外部投資信心降低，政府將被迫向外舉債。

加入歐盟對波蘭而言有幾項好處：第一，有助提升波蘭在歐洲的地位，以正式會

註④ Richard Baldwin, *Towards an Integrated Europe*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1994), p. 7.

註⑤ *The Economist*, March 29-April 4, 2003, p. 32.

註⑥ Jan Szomburg, "Between the Scylla of Own Incompetence and the Charybdis of Brussels's Inadequacy," *Rzeczpospolita*, February 20, 2003, p. A9.

註⑦ 請見舒曼中心研究報告，<http://www.robert-schuman.org/anglais/oece/pologne/referendum/default.htm>.

註⑧ *Rzeczpospolita*, April 22, 2003, p. B1; *Gazeta Wyborcza*, April 22, 2003, pp. 14~15.

員國的身分參與歐盟各項重要組織與整合事宜，波蘭政府亦可直接獲得來自歐盟各項基金的補助。^④第二，加入歐盟前，歐盟已佔波蘭出口總值的 70%，而歐盟 15 個舊會員國對波蘭的投資也佔波蘭外資的 70%，歐盟已經是波蘭最大的貿易伙伴，加入歐盟有助於波蘭進一步拓展雙方經貿關係。第三，波蘭加入歐盟可以享有歐盟單一市場的好處，享有產品在歐洲市場的公平競爭優勢；而波蘭民衆未來在歐盟其他國家的旅遊與工作權亦將受到保障。^⑤

除了正面效益之外，波蘭加入歐盟也必須付出相對代價，其所須要面對的問題包括對外關稅一致化帶來的稅收減少、結束對外來投資者的特殊待遇^⑥民生各項產品價格上漲、^⑦開放波蘭土地買賣市場、薪資上漲與勞工流動^⑧或短期資本流動帶來的投機行爲，這些問題還可能會進一步衝擊波蘭金融市場穩定等。

在本文外交政策分析的架構下，我們可從以下幾點來分析波蘭爲何選擇加入歐盟：第一，波蘭希望藉由加入歐盟來提高其在國際體系下的權力比重，然此與波蘭加入北約之差異在於，加入北約是透過軍事聯盟來增加相對權力（power）比重，而加入歐盟則著眼於未來的國家能力（capability）提升，雖然兩者目的相同，然其達成之途徑有所差異；除此之外，加入歐盟對於提升國家與民衆福祉更具直接效力，因此其行動目標遠較加入北約更爲廣闊。第二，從理性的考量基礎來說，波蘭加入北約與歐盟咸透過內部民主機制達成，其堅持以民主方式解決波蘭最終外交政策目標合理性的基本要素。第三，自波蘭決定申請加入歐盟之日起，外交決策者充分認知到加入歐盟對波蘭國家利益的正負影響，不僅國會議員充分辯論加入歐盟的好壞，媒體與一般大衆熱烈參與討論，報章媒體也製作長時期、一系列的各項關於歐盟過去與未來的新聞報導。持平而論，波蘭社會存在著公平公開的討論空間，富人與窮人的意見都有充分表達的管道，國會內部也有代表不同勢力的政黨爲民喉舌，對環境認知不至於與事實相差太多。第四，歷史思維提供波蘭民衆共識基礎，從最終波蘭公民投票分析過程中，多數波蘭民衆並不滿意目前波蘭加入歐盟所面臨的各項問題，如農產品及各項物價上漲、勞工暫時無法自由到他國尋找就業機會等，然最終民衆仍然投下贊成加入歐盟的

註④ 估計 2004-2006 年波蘭將要支付歐盟財政預算約 65 億歐元，而在相同的時間之內，波蘭將可以從歐盟財政當中獲得超過 190 億歐元的補助。

註⑤ Andrew Moravcsik and Milada A. Vachudova, "National Interests, State Power, and EU Enlargement," *Perspectives* (Prague), Vol. 19 (Winter 2002/2003), pp. 21~31.

註⑥ 多數中東歐國家自 1990 年代起成立免稅區以吸引外資，然加入歐盟後外資企業不得再享有特別的稅制減免。

註⑦ 新會員國政府必須解除各項產品的補貼政策，但此舉又會導致物價波動，致民生各項需求品價格上揚。

註⑧ 歐盟舊會員國擔心廉價的勞工衝擊當地勞動市場，因此提出一套過渡期方案以爲因應，即爲「2+3+2」方程式，前兩年舊歐盟國不向新會員國開放勞工自由流動，兩年後舊會員國得選擇是否再延長三年，五年之後歐盟將完全解除勞工的流動限制，而除非有國家基於原因提出申請（必須證明某一國家的勞工流動將會威脅到該國的勞工市場）才能再享有兩年期限。Peter A. Bod (former Hungarian Economics Minister and Central Bank Official), *Gazeta Wyborcza*, December 2, 2002, p. 38; *Polish News Bulletin*, December 10, 2002, pp. 6~8.

選票，其主要意涵即是放眼未來，希望能為下一代提供更舒適的生活環境，能夠進一步改善波蘭生活環境。

表四 波蘭外交政策分析：以加入歐盟為例

	權力追求	理性考量	心理因素	歷史思維
理論探討	重視國家能力與其相對權力的展現	決策者根據的理性基礎與追求目標之手段	影響決策者的心理因素，包含決策者所處的心理環境與操作環境	認同、語言、觀念、價值等將對外交決策產生重大影響
加入歐盟	主要著眼於加速現代化以提升國家能力 (capability)	符合程序與實質理性、集體理性與民主要素	決策者充分認知外在環境變化，決策過程經過充分討論	在歷史思維情境下著眼未來發展，願意付出相對代價以獲得未來更好發展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架構分析而得。

伍、美伊戰爭後的波蘭外交政策： 重回權力與安全思考的外交政策？

九一一事件與美伊戰爭後的國際政治發展有相當大變化，其對各國外交政策也有程度不一的影響。這些影響表現包括：國家的外交政策目標是否因此產生重大改變？如果改變，實現外交政策目標的手段是否也隨之改變；在實現外交政策目標之際，究竟是應該重視民主程序的決策程序還是重視實質目標的達成；國家資源如何需要因應外交政策目標而重新調整等。

就恐怖攻擊事件受害者的美國而言，其外交政策迅速做出回應與調整，除了進行肅清阿富汗恐怖組織與發動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外，美國外交政策目標亦有重大調整，這些調整表現在：強化打擊國際恐怖主義、致力解決區域衝突與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威脅，這些調整同時顯示在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 規劃之上。^⑩實際的策略規劃則是揚棄過去單純的圍堵政策，改而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策略 (pre-emptive actions)，同時採取鞏固華盛頓的堅實盟友 (consolidating Washington's alliances) 以支持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的行動，並在世界各地推展民主 (promoting the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以推動國家建設工作 (undertaking nation-building missions)。^⑪這些作為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手段、決策程序、制

註⑩ Se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註⑪ Ted Galen Carpente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Security Strategy: Implications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6, No. 3 (October 2003), p. 513.

度建構、甚至國家資源的重分配有相當大的影響。

美國為求打擊恐怖主義與穩定中東地區局勢而出兵攻打伊拉克，然其軍事行動同時亦對美波關係產生重大衝擊。對波蘭而言，波蘭的最佳戰略乃是與歐盟主要國家和美國同時交好，如此波蘭將可享有北約的外部安全保證，同時又能享有與歐盟各項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交流所帶來的好處，因此華沙政府並不希望在美國與歐盟之間表明立場，避免因為得罪任何一方而失去兩面交好的最大利益。然而美伊戰爭的爆發導致美國與德法等國產生嚴重對立，迫使波蘭必須表明立場。對波蘭而言，倒向任一方並非是最佳選擇，然當華沙政府被迫重新修正外交政策目標時，透過理性選擇的方式尋求鞏固波蘭國家安全並站在美國一方、維繫北約之存續，成為次佳卻必要之選項。

在美伊戰爭之前，波蘭已對歐盟推行之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和歐洲安全與防衛政策（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ESDP）有所憂慮，華沙政府擔憂歐盟推動的 ESDP 將會傷害北約的凝聚力。因此當美國準備發動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之際，波蘭總理 Leszek Miller、捷克總統 Vaclav Havel 以及匈牙利總理 Peter Medgyessy 協同英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麥共同發表聲明支持美國行動，緊接在這之後的是 10 個東歐國家也發表聲明支持。^①當波蘭決定參與美伊戰爭時，總統 Aleksander Kwasniewski 提醒波蘭民衆外交政策不作爲的後果，其主要訴求即是要波蘭民衆回顧 1939 年西方各國不願意爲了波蘭海港格但斯克（Gdansk）與德國決裂的問題，當時的姑息態度導致沒有國家願意幫助波蘭抵抗侵略，並引爆成二次世界大戰，導致日後波蘭遭德國佔領的後果。^②2003 年 3 月 24 日，波蘭國防部宣佈決定參與美國的軍事行動，派遣一支大約 200 人的小規模軍事武力支援美軍；軍事行動結束後並參與日後穩定任務（stabilization operation），派遣約 2500 人的特遣隊負責伊拉克中南部地區的穩定工作。^③

不過波蘭對參與美國的穩定任務也有不同聲音，這些不同聲音出現在政府與民衆兩層面。就政府層面來看，波蘭政府對於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未善盡告知波蘭政府伊拉克是否儲存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未善盡情報告知義務等情形感到不悅，^④同時也對波蘭須要負擔駐紮於伊拉克軍隊的花費不甚滿意。這些波美間的摩擦導致波蘭單方面宣稱要在 2005 年底之前將所有部隊從伊拉克撤回的消息。^⑤該訊息的

註① 這 10 個會員國分別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羅馬尼亞。請見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31, 2003, p. 3; *Polish News Bulletin*, February 20, 2003, p. 1.

註② *Rzeczpospolita* (Warsaw), March 25, 2003, p. A4.

註③ <http://www.people.com.cn/BIG5/guojj/22/83/20030331/958820.html>.

註④ 波蘭總統 Aleksander Kwasniewski 在無預警的情況下突然接受外國媒體採訪，表達波蘭對美、英、波情報分享之不滿。

註⑤ 波蘭總理 Marek Belka 在探訪波蘭駐紮在伊拉克的部隊時表示，波蘭將撤走留駐在伊拉克的 1500 名士兵，僅剩少數必要人力以配合伊拉克必要之軍事任務，不過實際上該部隊仍繼續延長。

釋放可能是基於某些政治操作，但也可能是波蘭對於美國穩定工作的目標無法掌握所致。

除波蘭政府對美國決策頗有微詞外，波蘭民衆對波蘭是否應繼續參與伊拉克穩定任務亦有不同聲音。就民衆角度而言，一般民衆對波蘭是否應參與伊拉克戰爭與其後的穩定任務呈現不同面貌：

1. 根據2003年2月的民意調查數據指出（美伊戰爭發動前），有48%的受訪者認為波蘭政府不應派遣軍隊前往伊拉克，而有36%的民衆支持出兵的前提是聯合國武檢人員須確實在伊拉克境內能夠找出大量毀滅性武器。另外有60%的受訪者認為波蘭可以有限度地參與美伊戰爭，波蘭民衆可接受派遣波蘭醫生前往遠離前線的區域協助執行該任務；^⑥

2. 2003年6月的民意調查數據（美伊戰後）指出，有高達71%的民衆認為波蘭軍隊其實一開始就不應該參與對伊戰爭，然對於參與戰後的伊拉克穩定任務，民衆支持的比率卻有45%，顯示民衆雖不認同政府參與對伊戰爭，不過卻有較高比率支持伊拉克重建任務；^⑦

3. 從美國發動對伊戰爭的經驗來看，有越來越多的波蘭民衆認為歐盟應該繼續發展獨立的軍事武力以應付未來可能的危機，並藉此鞏固歐洲本身的利益；^⑧

4. 最後，對於民意調查中波蘭民衆對歐盟與北約的好感度而言，波蘭民衆對歐盟好感度逐漸上升，對美國好感度則稍微下降。

從美伊戰爭事件中顯示出波蘭民意對歐盟好感度上升、對美國好感度下降的趨勢，但未來民意走向對外交政策影響如何還有待觀察。2005年9、10月，波蘭舉行國會與總統大選，國會選舉結果由右派的法律與正義（Prawo i Sprawiedliwość, PiS）和公民論壇（Platforma Obywatelska, PO）擊敗左派的執政黨，而總統一職則由同屬PiS的前華沙市長卡欽斯基（Lech Kaczyński）勝出。總統與國會大選結果顯示，波蘭政府目前均由右派執政，外交政策可能轉為較強調民族主義與國家主權之訴求，因此執政黨於總統大選結束後不久隨即出訪歐洲各國訪問，試圖化解各國對波蘭未來走向的疑問。^⑨不過從波蘭過去歷次的選舉經驗來看，亦顯示波蘭國會多數黨均未能於下一次選舉順利取得連任，以致形成左右輪替的現象，其原因應為選民普遍對執政黨施政結果不

註⑥ 民意調查數據乃綜合參考波蘭民意調查機構Pentor Research International及2003年2月份Polish Public Opinion Bulletin (CBOS)的調查報告，請見http://www.cbos.com.pl/PL/Opinia/2003/02_2003.pdf and *The Warsaw Voice*, February 16, 2003, p. 6.

註⑦ See CBOS, June 2003, http://www.cbos.com.pl/PL/Opinia/2003/06_2003.pdf.

註⑧ 同樣在民意調查中顯示，最高曾有77%的民衆支持歐盟發展獨立的軍事武力，其背後意涵即是樂見一個逐漸成形的歐盟國防力量，能夠獨立掌管歐洲防務事務。Antonio Missiroli, "Central European between the EU and NATO," *Survival*, Vol. 46, No. 4 (Winter 2004-2005), pp. 121~136.

註⑨ 波蘭新任總理Kazimierz Marcinkiewicz於2005年11月底前往歐盟訪問，化解歐盟對PiS並沒有和PO組成聯盟而是改與更右派的波蘭家庭聯盟 (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 LPR) 和自我防衛黨 (Samobrona, SO) 組成聯合內閣之疑問。請見http://www.eubusiness.com/East_Europe/051122140651.gwl4klu8.

滿。^⑧

新政府對未來外交政策的規劃，除了繼續加強與歐盟和北約的雙邊關係外，還勾勒三項外交政策目標：1. 加速推動於歐盟內部之發展；2. 加強跨大西洋（與美國）的安全合作面向；3. 建構波蘭為一可信賴的夥伴，協調波蘭與共同體彼此間的利益。^⑨這些顯示新政府強調國家主權與民族主義，在外交政策面向上也將強調跨大西洋合作的重要性；另外 PiS 在經濟政策上亦顯得相對保守，關於未來波蘭是否加入歐元區、何時加入等亦需觀察。

總括來說，美伊戰後的波蘭外交政策呈現一種相對分歧的局面。在決策面向上，政治菁英從國家傳統利益的角度思考外交政策的目標與走向，當政治菁英發現美國外交政策調整時，波蘭外交政策是否亦應隨之調整，在這個面向上，政治菁英採取的是一條較為「保守」的路線。保守的意義在於，這些政治菁英根據過去的歷史記憶與民主化後的執政經驗，得出國家核心利益——「安全」必須被完全滿足，歷史上的經驗告訴政治菁英，如果不採取相應的外交行動以鞏固霸權領導、如果不展現負責任的態度顯示捍衛國家安全的決心，則國家安全有再度陷入危機之虞；波蘭花了這麼多的力氣加入北約，目的即求鞏固北約能夠繼續在歐洲地區肩負領導安全的重要責任。這些外交政策的核心意涵在於「實質理性」主宰政治菁英的思考，他們根據現實的國際環境做出「理性」的判斷，亦即以北約作為安全保障的基石，以歐盟作為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助力。^⑩

對波蘭的政治菁英來說，民主在某種意涵上可能有害於國家利益的維護，過分強調集體協商的過程可能會導致效率不彰，國家行為將因此大幅受到限制，重要行動有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之背書誠屬上策，但如果缺乏授權，國家也不應就此自我侷限。

波蘭民衆的態度則是呈現和政治菁英較為不同的面向。波蘭民衆從民主化與非共化的過程中體驗了一種有別於政治菁英那種「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國際觀點，民衆希望能夠透過加入歐盟以改善生活條件，期望能夠早日重享與西歐各國相同的生活環境，而為因應加入歐盟，在波蘭境內所採取的一連串民主化改革與重視人權的作法，也使民衆更為重視「程序理性」的意涵，這個現象隨著波蘭較為年輕的一代接受歐洲共有的價值觀與信仰，散發到其他世代。波蘭民衆逐漸意識到組織規範的重要性，對「民主」成為生活中一項重要準則的接受度逐日提高，所以儘管波蘭民衆知悉波蘭國家利益與美國國家利益的相關性極高，但獲得國際組織的授權與接受國際

註⑧ 波蘭自 1989 年舉行第一次的部份自由選舉後，至今已舉辦過 1991 年、1993 年、1997 年、2001 年和 2005 年的國會大選，國會席次由 1991 年的多黨、1993 年的左翼聯盟、1997 年的右翼團結選舉行動、2001 年的民主左派聯盟及勞工聯盟左右輪流執政。請見王維芳，「後共波蘭國會大選探討其政治穩定性」，*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3 期（民國 91 年 5/6 月），頁 109～128。

註⑨ 見波蘭外交部年度施政報告，或見波蘭外交部官方網頁，<http://www.msz.gov.pl/Government,information,on,Polish,foreign,policy,in,2006,4599.html>。

註⑩ Marcin Zaborowski and Kerry Longhurst, "America's Protégé in the East? The Emergence of Poland as a Regional Lea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9, No. 5 (October 2003), pp. 1009～1028.

法的規範亦是國家外交政策中一個重要環節。先前歐盟擴張過程已經顯示出，藉由教育的過程重新理解認同與利益內涵，將共同價值內化成新的偏好（values can be internalized new preferences），^⑧此種經由社會化的過程而對國家利益之理解重構的現象，將會是影響未來波蘭外交政策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

最後，從政治菁英與民衆的態度分析來看，雙方雖然有態度上的差異，不過雙方仍有共通的交集點，這個交集點即是訴諸認同的力量。政治菁英透過對民族認同的訴求凝聚共識，該種訴求可以是對固有領土與共有歷史記憶之維護、公眾文化的培養、善盡共同合法的權利與義務等。^⑨本文認為歷史記憶尤其扮演重要角色，在歷經 10 餘年的民主化過程後，波蘭社會雖展現了具體的民主化成果，然歷史上波蘭亡國的時間卻遠較民主化過程與波蘭實質獨立的時間長久，因此該記憶短期內將扮演最後一道政治菁英與民衆共同可接受的最低利益交集。

表五 波蘭外交政策分析：以美伊戰爭為例

	權力追求	理性考量	心理因素	歷史思維
理論探討	重視國家能力與其相對權力的展現	決策者根據的理性基礎與追求目標之手段	影響決策者的心理因素，包含決策者所處的心理環境與操作環境	認同、語言、觀念、價值等將對外交決策產生重大影響
加入歐盟	配合美國國家戰略目標改變而對應調整，鞏固霸權歐洲的領導地位	政治菁英與民衆考量出現落差，雙方在實質理性部分不一致，且政府決策未透過適當程序反映民意	決策者在時間急迫與必須表明立場的環境下，回到強化先前對於環境不安全感的認知架構中	歷史記憶又再度被適時的提醒，並以此教育一般民衆，接受政府既定政策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架構分析而得。

陸、未來波蘭外交政策之可能變因

根據上述推論過程，本文認為未來波蘭的外交政策存在如下變化：

一、在權力極大化的架構下思考波蘭在北約與歐盟內部之發展

持續追求更多的權力與更穩固的外部環境仍是目前波蘭外交政策的主軸，在波蘭順利加入北約與歐盟之後，需要認真思考如何努力維繫北約的存在與波蘭如何在歐盟

註^⑧ Jeffrey T. Checkel,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3 (Summer 2001), pp. 553~588.

註^⑨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1), p. 14.

內部持續發展的問題。對波蘭來說，唯有北約持續向東擴展，才能達成波蘭理想的安全環境，這點在波蘭重要的領導人談話與政府政策中可見端倪。波蘭重要的政治菁英不只一次表示將大力推動該項政策，這些政策若干部分已經實現，但有極大部分仍待努力。^⑤這一項政策的基本概念在於波蘭希望創造一個向東擴張的動態「穩定區」與「現代化區」，藉以減輕波蘭東鄰領土的直接壓力，減輕因「安全困境」所帶來的不安定感。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波蘭如何自處於歐盟內部，波蘭一方面必須發揮既有的競爭優勢，在歐盟內部創造高於舊會員國的經濟成長；另一方面，波蘭也極力敦促歐盟與東鄰國家，如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盡速完成入盟程序。華沙政府認為，烏、白兩國若能加入歐盟，其在歐盟內部與波蘭競爭資源的代價將遠低於能夠向東擴張安全的代價。^⑥

二、波蘭參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發展

(一) 波蘭參與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

隨著歐盟不斷深化與擴大會籍的過程，歐盟發展出一套會員國間的合作模式。20世紀70年代啟動了歐洲政治合作機制（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 EPC），1992年馬斯垂克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奠定了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施行的基礎，規劃出未來歐盟擬訂政策與採取具體行動的基礎，對未來歐盟協調會員國在國際重要問題上採取共同立場與共同行動有重大影響。向整合目標前進的馬斯垂克條約在序言裡強調，成員國「決心採行一項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包括最終制訂一項成員國共同承擔防務的共同防衛政策，以強化歐盟認同及其獨立，並進一步促進歐洲與世界的和平、安全與進步。」^⑦馬約在第11條第1款列舉了CFSP的五項共同目標，以為未來歐盟努力方向。

這些為歐盟外交政策一體化的努力延續至今，外界觀察歐盟在納入10個會員國之後將會對歐盟CFSP產生何種影響。本文認為，新加入歐盟的波蘭對歐盟CFSP產生之影響，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

第一，歐盟東擴本身就是歐盟對外關係中一項重要目標。歐盟東擴的戰略目標基本欲消除東西歐對立局面，免除未來東西歐衝突之可能性，同時藉由加入歐盟的過程，

註⑤ 1999年前波蘭加入北約時，就曾表示即使沒有俄國的同意，波蘭依然支持波海三國加入北約；此外，波蘭總統也曾明確表示歐盟應該慎重考慮未來接納土耳其與烏克蘭成為新成員國，波蘭官方也毫不避諱地支持歐盟應該繼續東擴，請見 *Polish News Bulletin*, March 25, 2002, p. 2; *Polish News Bulletin*, December 7, 2004; or see December 6, 2004, <http://www.onet.pl>.

註⑥ 不過亦有學者認為只要國家存在，安全需求不可能有滿足的一天，對波蘭而言，只要俄國問題一日未解決，則其安全需求必定繼續存在。Stanislaw Koziej, "Polish Defense Policy's Evolution," and Boleslaw Balcerowicz, "Armed Forces in Polish Defense Policy," Roman Kuzniar, ed.,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1989-2000*, pp. 403 ~ 438.

註⑦ 請見馬斯垂克條約序言部份，*Preamble of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European Union*, February 7, 1992.

波蘭與其他中東歐會員國為求入盟而採行符合歐盟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法律各項標準，提升新會員國民主法治與市場開放等，即是歐盟外交政策重要目標。

第二，東擴為歐盟帶來 25 個會員國，未來將再增加 2 個，這可能會對未來歐盟決策體制造成影響。國家數目增加並不一定會造成決策困境，只有在決策者內部存有重大差異，如價值信仰問題、經濟發展差距、對安全的認知等，才可能會出現決策困境，外界擔憂的 25 國或 27 國決策問題即在於此。目前歐盟在阿姆斯特丹條約後引進建設性棄權的方式來解決共識決的障礙，為的是解決歐盟內部多數與少數陣營的對立局面，屬於少數陣營的會員國可藉由棄權的方式來取得多數陣營的讓步。⁸⁸另外，歐盟的條件多數投票制（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 QMV）則是以另一種方式處理共識決的問題。支持歐盟深化整合的國家，希望越來越多的事務採取 QMV；但是其他國家，如英國與波蘭，則小心翼翼地希望保留共識決（unanimity），也就是每個國家有最終否決的權力。

第三，對波蘭而言，波蘭支持歐盟推動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支持歐盟以一個聲音對外發言。原先波蘭無法以一個國家的地位處理的外交問題，可以藉由歐盟正式會員國的身分推動，以歐盟的整體力量來達成波蘭的目標。波蘭的東鄰政策即是一例，波蘭希望在歐盟體制內推動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的民主化運動，並最終納入這兩國成為歐盟東部前線國家，免除波蘭直接面臨俄國勢力的威脅。⁸⁹

第四，波蘭對未來歐盟外交政策的整合程度持保留意見。波蘭對於歐洲憲法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在外交政策部分設立「歐盟外交部長」（Unio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主導歐盟外交政策持保留意見，擔憂未來歐盟外交政策將逐漸由布魯塞爾（而非個別國家）共同決定。⁹⁰另外則是對歐洲憲法條約中的投票方式感到不滿，認為西歐各國違背了原先尼斯條約（Treaty of Nice）中給予波蘭的優惠地位（根據尼斯條約，波蘭於歐洲理事會擁有 27 票的決策權，是僅次於英法德義而與西班牙相當的國家，故又被稱為尼斯方程式 Nice formula）。⁹¹因此曾有波蘭政治菁英建議，波蘭應大膽提出可能否決歐盟憲法條約的訴求，以提醒西歐各國重視波蘭的聲音，因為假使憲法條約被否決，歐盟運作又將回到對波蘭有利的尼斯方程式。⁹²

註⁸⁸ See Article 23 (1) of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European Union*, February 7, 1992, or Borek Lizec, "Do European Security Capacities Have Feet of Clay?" *Perspectives* (Prague), Vol. 19 (Winter 2002/2003), p. 34.

註⁸⁹ 此即波蘭的地塹戰略，將波蘭與俄國隔開，避免波蘭成為東西陣營的權力競爭場所，請見 Marek Menkiszak, "Difficult Neighborhood: The Security Question in Polish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Roman Kuzniar, ed.,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1989-2000*, pp. 125~170.

註⁹⁰ *Rzeczpospolita*, August 29, 2003, p. A1.

註⁹¹ *Rzeczpospolita*, October 27, 2003, p. A10.

註⁹² 波蘭前外交部長 Jacek Saryusz Wolski (1991-1996, 2000-2001) 認為波蘭應該玩狠一點，因為「賭金很高」(it is worth to play tough because the stakes are very high.)，請見 *Gazeta Wyborcza*, September 30, 2003, p. 8; *Rzeczpospolita*, October 1, 2003, p. A1, A7.

最後，從波蘭加入歐盟對 CFSP 運作產生哪些實質影響來看，波蘭在加入歐盟前對歐盟 CFSP 持肯定態度，對歐盟採取的共同立場與共同行動幾乎毫無保留支持，因為其在加入歐盟前以順利加入歐盟為目標，完成入盟談判。但有一個例外凸顯波蘭對 CFSP 的堅持，2003 年波蘭與法德等國對是否支持美國發動對伊戰爭僵持不下，某些舊會員國認為波蘭是美國在歐洲地區的馬前卒（Trojan Horse），認為波蘭尚未加入歐盟前不應如此表明立場，部份會員國甚至以歐盟會籍威脅波蘭應謹言慎行；^⑤加入歐盟後，波蘭所受限制雖然較少，從目前觀察來看，華沙政府仍樂意配合歐盟發表的聲明、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有學者認為，經過伊拉克事件的影響，波蘭與德法等國均體認到外交政策協調的重要性，因此未來出現雙方公開決裂、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將會減少。^⑥

（二）歐盟軍事整合意涵與波蘭外交政策

與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息息相關的是歐盟軍事整合，1992 年，西歐聯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 WEU）通過彼得堡任務（Petersberg Tasks）將人道救援與危機處理納入西歐聯盟的工作項目，1997 年更將這項任務劃入阿姆斯特丹條約中，凸顯歐盟未來處理軍事任務的依據。^⑦不過歐盟軍事整合的重大突破還是在於 1998 年英法兩國在聖馬洛高峰會（St. Malo Summit, 1998）達成共識；^⑧後繼的聖馬洛宣言及其後的科隆高峰會（Cologne Summit, June 1999）、赫爾辛基高峰會（Helsinki Summit, December 1999）、拉肯高峰會（Laeken Summit, 2001）等不斷確認歐盟發展獨立軍事武力的重要性。儘管目前歐盟想要達到的目標有限，其目標是在自願合作的範圍內，在 60 天之內部署 5-6 萬人的部隊，並且能持續彼得堡任務長達一年以上，這項目標表現在輪值國希臘國防部長 Yiannos Papantoniou 於 2003 年 5 月 19 日宣佈快速反應部隊（European Rapid Reaction Force, ERRF）成軍。不過相關需要改善的軍備問題仍然存在，由於該部隊並非常設武力，況且若干重要設備仍須向北約商借，高科技武器如精靈炸彈、空中加油機、偵查裝備以及重型運輸機等仍需加強。^⑨此外，國防

註⑤ 法國總統席哈克公然要求波蘭在內的中東歐國家對美國攻打伊拉克事件閉嘴，並以否決入盟條約威脅這些國家之親美立場。

註⑥ Fraser Cameron and Antoinette Primatarova, "Enlargement, CFSP and the Convention: The Role of the Accession States," *EPIN Working Paper*, No. 5 (June 2003), p. 11.

註⑦ Article J.7.2 *Treaty of Amsterdam*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7); or Alistair Shepherd, "The European Union's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A Policy without Substance?" *European Security*, Vol. 12, No. 1 (Spring 2003), p. 41.

註⑧ 英國表達有意發展歐洲安全與防衛政策的意圖後，歐洲軍事整合邁入新階段。英國先前對歐洲軍事整合態度較為消極，英國擔憂歐洲軍事整合將有害北約組織的功能運作。不過當英國認知到波士尼亞與科索沃危機爆發和歐洲各國無力承擔衝突的相關性後，要求改變歐盟防衛政策之呼聲自然受到重視，請見甘逸驊，「歐盟憲法條約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憲法條約與歐盟未來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民國 94 年 10 月 7 日）。

註⑨ 歐盟雖然將部隊人數限定在 6 萬人之內，但如果加上正常輪替的部隊調動，實際上可能需要近 3 倍的人數，請見 Brian Crowe, "A Common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after Iraq?"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9, No. 3 (May 2003), pp. 533 ~ 546.

預算在歐盟會員國偏低的現象，也是造成美國與其他會員國軍事能力差距日益擴大的原因；歐盟會員國普遍不願意在國防經費上投注大量研發經費，也是造成歐美雙方軍事實力差距逐年增加的原因之一。^⑧

上述這些問題影響了波蘭對於歐盟軍事整合的態度。波蘭並不樂見尚未完成整合的歐盟就先有獨立的軍事武力，外交與防衛政策的整合歷來就是歐盟整合的核心爭議，外交與防衛政策是否應該整合？如何整合？政策整合的核心所在？這些都是各國辯論的焦點，作為新加入歐盟的會員國，波蘭並不樂見象徵國家主權重要意涵的外交與國防政策頓時又落入其他單位的決策範圍。波蘭所堅稱的理由是，不同的國家所面臨的外部環境並不相同，對於安全需求也不會有相同標準，而其所構建出來的戰略目標與戰略文化當然也會有所差異。^⑨

第二，更為關鍵的則是美國和北約在歐洲的地位問題。從傳統的權力平衡來看，霸權會小心翼翼地觀察潛在挑戰者的軍事成長，雖然目前美歐雙方無論在意識形態與文化的臨接性上皆有正向相關，但美國對歐盟發展 ESDP 仍有些許擔憂。美國的前提是要歐盟能提升軍事能力，並在合作的基礎上處理雙方關係，而非僅著重在軍事制度之建立上。另外一個考慮的焦點集中在 ERRF 部署的範圍與其行使的功能，這些問題與美俄相關，因為歐盟目前仍未能在不顧美國與俄國的反對下部署 ERRF 在與美俄重大利益相關的區域內；同時，美國仍須顧慮未來若歐盟的快速反應部隊牽涉與其他國家紛爭，可能因此介入其中。最後，若 ERRF 不能根據自己的利益規劃戰略部署，則 ERRF 在國際安全事務的影響力將會被大幅侷限，對執行與維護歐盟的利益可能有所妨害，也可能影響波蘭的國家安全利益。^⑩

柒、結 語

從波蘭後冷戰時期外交政策的演變來看，加入北約與歐盟是其兩大外交政策主軸，此兩大外交政策目標的達成凸顯政策兩大本質：外部安全與持續現代化的政策目標。波蘭政府亦同時希望能夠避免採取選邊站的外交政策，企圖在歐盟與美國之間採取一條相對模糊的外交政策路線，藉以兩面討好。這種外交政策卻因為美伊戰爭而陷入困境，波蘭被迫採取重新向美國靠攏的外交政策。本文嘗試從外交政策分析角度重新理

註^⑧ 從國民生產毛額的比較來看也一樣，歐盟會員國的國防經費佔GDP的比率僅1.7%，低於美國的3%。從研發經費來看，歐盟的研發也僅佔美國的四分之一。除此之外，歐盟與美國軍事力量差距日益增大的原因不僅在預算層次，同時也因為歐盟是相互獨立的國家，因此有不同的國防目標，例如各國都有數量不一的常備兵役，但徵兵制度並不適用於危機處理狀況，同時派遣赴海外執行任務之意願也較低。請見 <http://defence-data.com/archive/page13409.htm>。

註^⑨ Trevor Salmon and Alistair Shepherd, *Toward a European Army-A Military Power in the Making?*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pp. 181~199.

註^⑩ Alistair Shepherd, "The European Union's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A Policy without Substance?" p. 54.

解波蘭後冷戰時期三大外交政策：加入北約、歐盟暨美伊戰爭後的外交政策，以權力追求、理性考量、心理因素、歷史思維四大要素做橫向分析，此種方式避免了以單一理論進行分析的可能偏頗，並在該基礎上嘗試勾勒未來外交政策變化的基本格局。本文認為，從波蘭後冷戰時期加入北約的外交政策來看，加入北約是爲了滿足外部安全環境需求，主要思考是透過外交政策調整來獲得安全保證，藉以獲得更穩固的權力地位，決策者爲滿足對安全之渴望而加入北約，其對國家利益之判斷亦符合理性模式。

其次，加入歐盟則主要偏向以現代化過程提升國家能力的思考，政治菁英透過程序理性取得全民共識，並給予民衆積極表達意見與參與空間，因此在充分認知外部環境變化的前提下，政治菁英與一般民衆對加入歐盟有高度共識。

再其次，美伊戰爭對波蘭外交政策而言屬突發性的狀況處理，因此波蘭政府僅能從實質理性的角度處理「何種外交政策」才是波蘭國家利益所在。政治菁英除了以歷史思維的記憶強化決策正當性、外交政策機械式的向權力追求的方向擺動外，波蘭政府同時在強調效率的前提下，犧牲了外交政策的協調性與現代國際社會較重視的國際法拘束與國際組織授權等問題，這對正在熟悉歐盟制度運作、價值與信念如何融合的波蘭而言，使華沙政府暫時重新回到現實主義的運作框架。

最後，波蘭外交政策並非一成不變，影響未來波蘭外交政策變化的可能變因在於波蘭將如何對安全環境重新評估，這當中包含北約是否能夠繼續扮演安全保證者的角色、波蘭如何評估潛在敵人的動向、對地緣政治變化的判斷是否合於波蘭國家利益等，北約持續東擴與繼續和俄國保持良好互動有助於緩解波蘭外部安全環境的不安感，可以讓波蘭在後冷戰時期獲得主權獨立之果實得以延續，滿足波蘭的安全需求。但影響波蘭對安全環境評估的要素不僅止於北約能否繼續存在於歐洲大陸，更關鍵的因素可能在於重新對歐洲安全本質的探究，以及對俄國未來發展、波俄關係的擬定等。

對安全環境重新評估的可能性來自於政治菁英或一般民衆對外交政策目標的認知重構，從波蘭參與美國攻打伊拉克及其後的穩定任務來看，政治菁英與一般民衆對美國的軍事行動有不同的支持度，政治菁英礙於國家利益之維繫而支持美國軍事行動，然一般民衆卻對何謂波蘭國家利益之認知產生基本鬆動。儘管這些鬆動目前並不明顯，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層次如何亦難有定論，但一般民衆對「歐洲」的概念逐漸顯現，與此相關的則是對於歐盟是否應該繼續深化、歐盟是否應該繼續擴大軍事與外交層次的整合、歐盟是否應該繼續向外推展歐洲人的價值觀等，這些變化也很可能是影響未來波蘭外交政策走向的重要關鍵因素。

* * *

Analysis of Pol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San-yi Y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Abstract

The shift in foreign policy of Poland during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ignificant proc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politic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hanges of foreign policy structure of Poland after the joining of NATO, EU and the US-lead war on Iraq. The changes are motivated by the strength on pursuit of power, rationality of the state interest,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on the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is analysis draws the conclusion to the cause in Polish foreign policy change. First, the joining of NATO being the need of Poland for a secure external environment; by adjustment of foreign policy to ensure a secure environment, the leadership through rational judgement fulfills the id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rerequisite. Second, joining of EU being the hope of modernization and reaching of higher status of state; legal process are required to gain popular consensus. Third, the US-lead Iraqi War being the challenge for Poland dealing with sudden unexpected circumstanc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Polish government facing the challenge are endown with making rational choices, strengthening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nfluence on foreign policy adjustment.

Keywords: Pol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NATO; EU; US-lead War on Iraq

參考文獻

- 王維芳，「後共波蘭國會大選探討其政治穩定性」，*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3 期（民國 91 年 5/6 月），頁 109~128。
- 甘逸驊，「歐盟憲法條約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憲法條約與歐盟未來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05 年）。
- 楊三億，「後冷戰時期中、東歐地區權力結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2 期（民國 91 年 3/4 月），頁 97~99。
-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民國 94 年 1/2 月），頁 115~137。
- Adler, Emanuel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Adorno, T.W., E. Frenkel-Brunswick, D.N. Levinson and R. N.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1950).
- Assenova, Margarita, "The Debate on NATO's Evolution,"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003, pp. 49~51.
- Baldwin, David A.,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Baldwin, Richard, *Towards an Integrated Europe*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1994), p. 7.
- Cameron, Fraser and Antoinette Primatarova, "Enlargement, CFSP and the Convention: The Role of the Accession States," *EPIN working paper*, No. 5 (June 2003), p. 11.
- Carpenter, Ted Gale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Security Strategy: Implications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6, No. 3 (October 2003), p. 513.
- Checkel, Jeffrey T.,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3 (Summer 2001), pp. 553~588.
- Crowe, Brian, "A Common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after Iraq?"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9, No. 3 (May 2003), pp. 533~546.
- David, Charles-Philippe, "Alice in Wonderland Meets Frankenstein: Constructivism, Realism and Peacebuilding in Bosnia,"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London), Vol. 22, No. 1(April 2001), pp. 1~30.
- East, Roger and Jolyon Pontin, *Revolution and Chang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Wellington House, 1997).

- Elster, Jon,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21 ~ 68.
- George Grayson, *Strange Bedfellows: NATO Marches East*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9).
- Hill, Christopher,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Interparliamentary Relations Bureau of the Chancellory of the Sejm ed., *The New Baltic Security Environment: Trends and Challenges* (Warsaw: Sejm Publishing Office, 1998), p. 74.
- Keltrup, Morton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 Krause, Keith, *Culture and Security---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 Kriendler, John, "NATO's Changing Role: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or Peacekeeping," *NATO review*, Vol. 41, No. 3 (June 1993), pp. 16~ 21.
- Kuczynski, Les, *Expansion of NATO: Role of the Polish American Congress* (Chicago: Alliance Printers and Publishers, 1999).
- Kuzniar, Roman,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1989-2000* (Warsaw: Scholar Publishing House, 2001).
- Little, Richard and Steve Smith, (eds.), *Belief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1988).
- Lizec, Borek, "Do European Security Capacities Have Feet of Clay?" *Perspectives*, Vol. 19 (Winter 2002/2003), p. 34.
- Markowski, Radoslaw and Edmund Wnuk-Lipinski, eds., *Transformative Path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arsaw: Instytut Studiow Politycznych Polskiej Akademii Nauk, 2001), pp. 119~ 131.
- Marusiak, Juraj, "Poland as a Regional power and Polish-Slovak Relation," *Slovak Foreign Policy Affairs*, Vol. 2, No. 1 (Spring 2001), pp. 36~ 55.
- McGrew, Anthony G. and M. J. Wilson, (eds.), *Decision Making: Approaches and Analysi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2).
- Mearsheimer, John,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 Mearsheimer, Joh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Norton & Company, 2001).

- Missiroli, Antonio, "Central European between the EU and NATO," *Survival*, Vol. 46, No. 4(winter 2004-2005), pp. 121 ~ 136.
- Mizerski, Witold, *Tablice Historyczne* (Warsaw: Wydawnictwo Adamantan, 2002), pp. 295 ~ 297.
- Moravcsik, Andrew and Milada A. Vachudova, "National Interests, State Power, and EU Enlargement," *Perspectives* (Prague), Vol. 19 (Winter 2002/2003), pp. 21 ~ 31.
- Morgenthau, Hans,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 pp. 106 ~ 144.
- Piatas, Czeslaw, "Polish Armed Forces and NATO Membership," *Military Technology*, Vol. 28, Issue 8 (August 2004), p. 35.
- Salmon, Trevor and Alistair Shepherd, *Toward a European Army-A Military Power in the Making?*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pp. 181 ~ 199.
- Sandler, Todd and Keith Hartl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O---Past, Present, and into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0.
- Shepherd, Alistair, "The European Union's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A Policy without Substance?" *European Security*, Vol. 12, No. 1 (Spring 2003).
- Smith, Anthony D., *National Ident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1), p. 14.
- Snyder, Richard, (e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 Sprout, Harold H.,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Co., 1962), pp. 122 ~ 135.
- Stanford, George, "Overcoming the Burden of History in Polish Foreign Policy,"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 19, No. 2 (June 2003), pp. 178 ~ 203.
-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NATO Enlargement: US and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Assist Potential New Member, Report to the Chairman,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GAO/NSIAD-97-164, US GAO, Washington, D.C., June 1997.
- Waltz, Kenneth,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1993), pp. 44 ~ 79.
- Waltz, Kenneth,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Mass: Little Brown, 1967).
- Winid, Boguslaw, *Rozszerzenie NATO w Kongresis Stanow Zjednoczonych 1993-1998* (Uniwersytetu Warszawskiego: Rozprawy I materialy Osrodka Studiow Amerykanskich, 1999).
- Yunus, Mohammed, *Foreign Policy: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32.

Zaborowski, Marcin and Kerry Longhurst, "America's Protégé in the East? The Emergence of Poland as a Regional Lea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9, No. 5 (October 2003), pp. 1009~1028.